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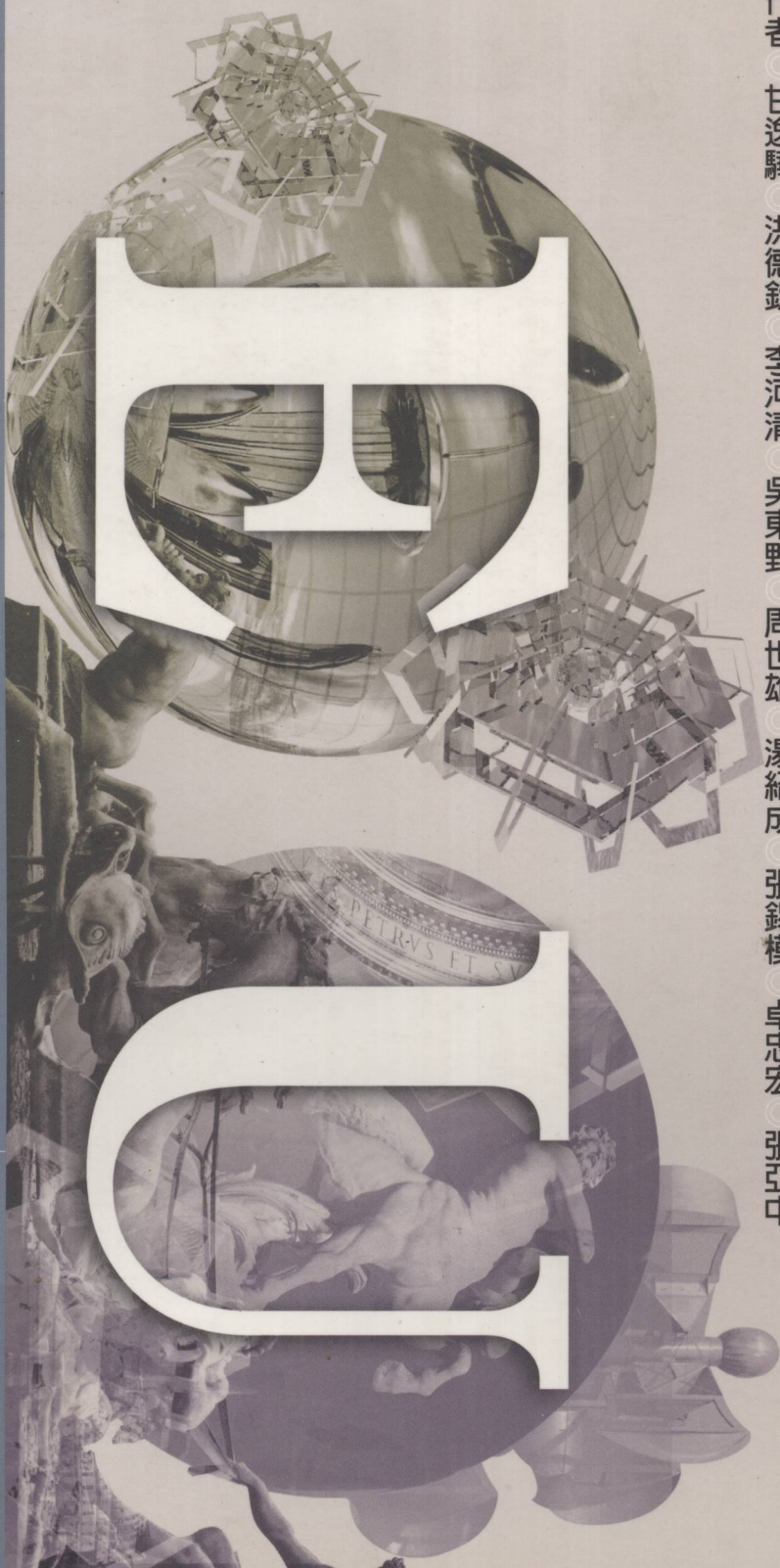
張亞中◎主編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歐洲研究中心◎出版

歐盟全球戰略與對外關係

作者◎甘逸驊◎洪德欽◎李河清◎吳東野◎周世雄◎湯紹成◎張錫模◎卓忠宏◎張亞中

國際關係研究叢書



EU's Global Strategy and Foreign Relations

晶典文化事業

歐盟全球戰略與對外關係

主編 張亞中

作者	甘逸驊	張亞中	洪德欽
	李河清	吳東野	周世雄
	湯紹成	張錫模	卓忠宏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歐洲研究中心 出版

晶典文化事業出版社

目 錄

導言

1

歐盟與大國關係

- 歐盟與美國：「柔性平衡」或「硬性平衡」？ 甘逸驊 11
歐洲聯盟中國政策的戰略分析 張亞中 37

歐盟的全球角色

- 歐元的國際地位 洪德欽 83
歐盟與環境：以京都議定書為例 李河清 113

歐盟與區域關係

- 歐盟對中亞地區之戰略作為：強權政治的意涵 吳東野 137
歐盟與印度邁向戰略夥伴關係之研究 周世雄 175
歐盟與東協：兩個不對稱的合作夥伴 湯紹成 193
重返歐洲地緣政治：烏克蘭與美歐俄角力 張錫模 223
歐盟與地中海夥伴關係之建立與展望 卓忠宏 249

導言

無論是全球政治、經濟、社會或是文化議題上，歐洲都影響著全世界。走過工業革命以後的歐洲，一開始就扮演著全球引導者的角色，它們全球戰略的結果，改變了世界的政治面貌、經濟型態、社會價值，以及文化的融合與衝突。

近代的歐洲，一舉一動都牽動著整個世界的發展。他們彼此之間的競爭，使得全球的情勢快速變遷。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歐洲主宰著世界，歐洲文明的同義詞是現代文明。

歷經兩次世界大戰，歐洲暫時沈寂，忙著在自己的土地上重建家園，沒有能力再領導全球。美蘇兩個國家舉起意識形態的大旗，分屬兩個陣營的西歐與中東歐國家只能尾隨在美蘇的腳後，再也沒有自己的全球戰略。

戰後的歐洲，從民族國家的神話中突然甦醒，了解到，要讓歐洲重新再起，必須重建歐洲人的新政治形態。對這些曾經創造出不同政治聯合體的政治精英而言，並不是件困難的事，在「聯邦」、「邦聯」之外，1950年代起，創造了「歐洲共同體」這個新的政治組織。

簡單的說，歐洲共同體建立的目的只有兩個。第一、歐洲土地上不要再有戰爭，希望經由共同體的建立，達到歐洲的永久和平；第二、加速歐洲經濟的發展，集群體之力，團結在一起，增進經濟繁榮。

東西冷戰的對峙，並沒有減緩西歐的發展。在冷戰結束前，歐洲共同體已經成為世界的經濟強權。蘇聯一瓦解，冷戰一結束，歐洲共同體就迫不及待地思考它在未來的角色及影響力。

「歐洲聯盟」經由1991年簽署，1993年生效的馬斯垂克條約，

正式成立。冷戰後的歐盟，先是將富裕的瑞典、芬蘭、奧地利等國納入，然後再吸納了原屬於社會主義陣營的中東歐國家，歐洲似乎又重回以往神聖羅馬帝國的一統局面。

廿五個成員國的歐洲，所盤算的已經不再是原有的歐洲和平與經濟發展，而是如何在全球化的世紀中，重新發揮其傳統的影響力。歐洲是否可以與美國在全球事務中平起平坐，甚而主導世界秩序與價值，歐盟的政經精英展現出他們的企圖。

本書就是在討論這麼一個發展中的議題，希望對於歐盟的全球戰略與對外關係有更一層的探索與分析。

本書是國內關心歐盟研究的朋友共同努力的結果。

2004年，台灣大學政治學系與歐洲聯盟建立了合作關係，得到莫內計畫的補助與支持。2005年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成立了「歐洲研究中心」，希望能夠為國內的歐洲研究做出一些綿薄的貢獻。

2005年12月16日，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歐洲研究中心主辦「歐盟與全球政治」學術研討會，邀請國內對於歐盟有專精研究的學者，針對歐盟的全球戰略與對外關係發表論文，共同探索未來歐盟的全球角色。

在外交部的支持下，研討會的成果得以以專書的面貌呈現，也算是為國內歐盟研究留下一些記錄，提供未來的研究者方便參考。

本書的撰寫者均是國內一流俊彥，也是在相關領域中已有傑出的研究成果者。作者們希望本書的出版能夠為國內歐盟研究增添若干心得，並收拋磚引玉之效。

本書分為三大部分，分別為歐盟與大國的關係、歐盟的全球角色，以及歐盟與區域關係。由於篇幅有限，歐盟與大國關係中，本書僅討論歐盟與美國，及歐盟與中國的關係。在歐盟的全球角色部分，本書從歐元與環境議題來論述歐盟在全球的影響力。在歐盟與區域關係方面，則分別從歐盟與中亞、印度、東協、烏克蘭及地中

海等區域的關係作切入。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甘逸驊用「柔性平衡」或「硬性平衡」的觀點來探討歐盟與美國的關係。他認為，在後冷戰時期的次級強權當中，歐洲聯盟扮演一個非常特殊的角色。雖然歐洲與美國仍分享重要的文化與宗教價值，但藉由其多面向力量的發展，歐盟已逐漸建立起全球的戰略地位，並運用國際多邊機制推動歐洲所主張的價值體系，因此屢與美國的立場相違背。在冷戰時期，歐洲與美國或許對於戰術性的問題具有不同意見，但對於全球戰略議題則意見幾乎一致；但是後冷戰時期兩者的差異，卻彰顯了歐美在戰略議題的歧見。歐盟在重大國際議題上與美國的背道而馳，已形成對於此一超強的抗衡作用，但是傳統強調軍事力量的「硬性平衡」概念，無法有效解釋歐盟如何運用非軍事手段追求與美國力量的平衡。該文試圖提出「柔性平衡」的相對概念，亦即次級強權試圖以軍事力量以外的手段，獲致抗衡超強達成其戰略利益的目的，來檢驗歐洲與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的關係，是否存在系統性的柔性平衡。

甘逸驊在該文中，首先提出現實主義對於權力平衡的主要論述，接著討論後冷戰時期學者們所提出的各項柔性平衡理論，在實際的個案方面，該文特別著重在歐洲聯盟於後冷戰時期與美國在重要國際議題上的歧異，並因此檢驗是否形成對美國的柔性平衡策略；該文在結論部分，除了試圖在理論的層次，提出柔性平衡對於權力平衡理論的適用與補充之外，也期待在政策方面，提出次級強權的個別或聯盟可能藉由柔性平衡方式，產生對於新時期國際體系的影響。

1990年代中期起，中國大陸的政經角色日形重要，歐盟在1993年成立後，也開始重視亞洲在歐盟全球戰略中的地位。歐盟的中國政策，一方面是歐盟新亞洲政策的一環；另一方面，也是歐盟大國

政策中的一個重點。國內外探討歐盟「中國政策」的文章並不算少，但是多屬時事性的分析。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亞中特別從「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與「善治」等三個國際關係理論角度來探索歐盟對中國政策的產出背景與運作邏輯。該文從實踐面著手，針對歐盟與中國對彼此發表的八份文件，分析歐盟對中國政策的具體實踐，並檢視歐盟與中國在「軍售」、「WTO 與市場經濟地位以及「人權」三個問題上的互動與折衝。另外，該文也檢討與評估歐盟對中國政策的運作成效，以及歐盟內部成員國的立場對於歐盟對中國政策產出的影響，並展望歐盟的中國政策對其區域與全球戰略佈局的未來發展。

該文認為，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思維仍將對主導歐盟的中國政策，歐盟成員國間的立場與態度，也會對未來政策的走向具有一定的主導作用；然而，在其全球戰略的規劃上，歐盟將積極納入「善治」的思維，用以推動與中國的交往和合作，以達到和平演變中國體制，並讓中國承擔更多的全球治理責任，達成建立一個和平與穩定的國際社會的最終目標。

歐洲共同體成立之初，是以經濟整合為首要目標。1979 年建立歐洲貨幣體系，1987 年單一歐洲法生效，歐洲成為一個單一的經濟市場，接著在馬斯垂克條約中，歐洲「經濟暨貨幣聯盟」正式成形，並確定「歐元」為未來歐盟的單一貨幣。歐元 (Euro) 於 1999 年 1 月 1 日發行，並於 2002 年 1 月 1 日正式在市場流通。

或許在軍事戰略上，歐盟仍舊無法與美國匹敵，但是五十餘年，歐盟在經濟上的成功統合過程，使得全球的經濟絕對無法忽視歐元領域。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洪德欽即針對歐元的全球地位做一論析。

該文首先就歐元的概念與功能做一介紹，在討論到歐元對於國際財金體系的影響時，該文分別從歐盟執委會、美國「國際經濟研

究所」所長博格斯丹 (C. Fred Bergsten) 教授的觀點做評論。另外，歐元在國際貿易與金融方面的影響力也是該文討論的焦點。

歐元發行對國際貨幣與金融體系帶來重大深遠之影響。歐元在各國外匯準備部位、國際貿易、國際債券市場、股票市場、外匯市場做為報價、計價或理財工具，也逐漸擴大其交易部位與貨幣功能，因此提高了歐元之國際地位。該文乃從法律觀點與實證資料，從事歐元功能之政策分析，研究論證總結指出，歐元已成為國際主要通貨，取得重要國際地位。

該文並認為，歐元發行是第二次大戰之後，國際貨幣及金融體系之一件大事。歐元已成為國際主要通貨，各國外匯市場之釘住貨幣或參考貨幣。歐元在各國及全球之外匯準備部位也逐漸提高。另外，歐元在國際貿易得做為報價與結算通貨。歐元在國際貨幣、債券與股票市場得做為計價、投資及儲值通貨或理財工具。凡此種種，在在顯示歐元之國際地位與貨幣功能，已日益增加，值得重視。

歐洲國家由於地少人稠，對於環境議題的重視一向走在環保團隊的前面。中原大學通識中心的李河清教授即是以京都議定書為例來探討歐盟如何在環境議題上展現其全球的影響力。

該文首先指出，全球暖化和氣候變遷已成為國際重大環境問題，聯合國於 1992 年訂定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建立全球溫室氣體減量共識，又於 1997 年訂定京都議定書，具體訂出減量目標與時間表，並由工業國家領先減量，在 2008 到 2012 年間將六種溫室氣體（主要為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減至比 1990 基準年再少 5.2%。該議定書於 2005 年 2 月 16 日生效，全球氣候治理的典範於焉成型。

歐盟一向關注環境議題，在京都議定書談判期間，曾倡議經由市場機制達成減量目標。特別是 2001 年 3 月美國布希當局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後，歐盟便積極參與談判並主導協商議題，且採取創新的政策工具。該文即以京都議定書為例，探討歐盟參與氣候談判

的過程，並檢視氣候政策的執行及成效。從執行細項觀之，其減量目標(8%)高於議定書的平均值；其減量措施創新而多元：包括推動彈性機制、提高能源效益、發展再生能源，其中尤以排放交易方案 ETS(Emission Trading Scheme)已於 2005 年 1 月率先正式實施，其成效則透過定期成效進度報告進行追蹤與監督，預計在 2010 年前即達成 11.3% 的減量目標，成為氣候治理的領先者。

1991 年蘇聯解體之後，中亞成為全球安全情勢最具挑戰的地區之一，強權在中亞的權力競逐亦日趨白熱化。對積極邁向世界強權的歐盟而言，中亞天然資源豐富又位居反恐戰略要衝地位，是兵家必爭之地，但受制於地緣政治因素，歐盟在中亞儼然還不是戰略主導者，其與中亞國家關係迄今仍根據 1999 生效的「夥伴暨合作協定」，缺乏一套完整的戰略規劃。2003 年 11 月喬治亞爆發「玫瑰革命」，隨後又在前蘇聯地區引發連鎖效應，使歐盟在中亞的戰略再成討論議題。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東野特別針對後冷戰時期歐盟對中亞地區的作為撰文析論，該文主要係從歐盟「歐洲睦鄰政策」的面向切入，分別檢視歐盟對中亞的政治、經濟和安全戰略評估與作為，釐清歐盟在中亞權力競逐的角色定位，繼而勾勒出歐盟對中亞戰略布局的遠景。

該文認為，就政治關係的面向觀察，中亞各國的政經條件距歐盟設定的標準尚遠，因此短期內歐盟不會大幅度地提升與中亞地區的關係，雙邊政治關係發展的立即影響也不會很明顯。然而，就「大歐洲」概念與重視「善鄰關係」的戰略意涵來看，歐盟既然把對中亞的戰略利益置於十至十五年之後，那麼檢視歐盟與中亞政治關係的影響面向之前，可能要先觀察歐盟對中(東)歐地區的戰略成果與影響；換言之，當十個東歐(含波羅的海)國家在 2004 年 5 月加入歐盟後，歐盟的邊境就向前推進到前蘇聯地區，必然因此讓歐盟思考如何制定更嚴謹且議題更廣泛的對中亞戰略規劃。

該文特別指出，就經濟合作的面向來看，歐盟國家除德英法三國之外，其他成員國即便與五國建立邦交卻普遍未設立使館，這表示歐盟國家認為中亞的商機不大，擴大市場並非歐盟對中亞戰略思維的重點，真正催化歐盟加強重視中亞發展的是防範非傳統安全威脅及穩定戰略資源的運輸管道。就軍事合作關係的面向觀察，歐盟與中亞區域安全組織尚未建立合作對話機制，現階段介入中亞安全事務的強權除了美、俄、中三強外，勉強可以將法德英三國列入。歐盟未來對中亞的戰略作為，應該不會忽視與中亞周邊區域強權的穩定關係。目前受限於地緣因素，當前的政治實力又難與美、俄、中等強權匹敵，歐盟短期內仍非中亞地區具關鍵影響力的競爭者，歐盟未來是否能在中亞地位發揮戰略主導者的角色將取決於歐盟是否能夠加速其政治統合，以及是否對於中亞地區具有高度的戰略企圖。

歐盟有計畫的與亞洲接觸應該是在 1996 年的亞歐會議，雙方開始建立制度性交往管道，而當時做為亞洲方面的代表正是東協。

由於不同的歷史背景，歐盟與東協在組織結構與機制運作上，都有極大的差異。歐盟的整合具有超國家的特色，其整合程度甚高。而東協至今都還只能算是一個以政府間主義為主的合作機制，其組織簡單鬆散，而兩者之間的差異，也確實反映了歐亞兩地不同的價值與文化，但是這並不妨礙兩個區域組織的互動。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湯紹成稱歐盟與東協是兩個不對稱的夥伴。該文認為，從歐洲的角度觀之，歐盟與東協的雙邊關係原本並不重要，在經過對於國際安全的共識與人權的爭議之後，經貿的利益也開始突顯，雙方關係才比較緊密。而整個過程起伏，或高或低，帶有幾分戲劇性，但其進展卻也還差強人意。相較而言，歐盟對於東協的重要性比較高，其影響力也比較大，兩者之間也還有相當的不對稱性，其中人權問題則還是雙方的困擾，可是

與以往相比較，其破壞性已經減低許多。但是，當前，歐憲的困境以及中國勢力的崛起，卻都對於雙方的發展憑添了不少變數，這都會對於歐盟與東協關係的發展，產生負面的影響。

一些西方戰略家認為，印度已經逐漸成為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亞洲大國，對於有志涉入亞洲事務的歐盟而言，自然必須與之發展外交關係，印度也希望透過與歐盟的合作，成為國際多極體系當中的重要一極。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教授周世雄教授為此特別就歐盟與印度邁向戰略夥伴關係撰文論述。該文主要探討全球化背景下歐盟及印度的外交政策及實踐，以及雙方如何發展戰略夥伴關係，並評估歐印關係的未來發展。

該文認為，就歐盟而言，後冷戰時期逐漸有意於涉入亞洲事務，既爭取商業利益也提升其在亞洲和全球政治地位。對印度而言，政治上希望提昇國際地位，爭取更多國際支持；經濟上，爭取更多資金與技術。這些需求，使得雙方形成互補互利局面。

該文並進一步指出，在經濟上，歐盟先進的科學技術與資金，為印度現階段經濟發展之所需，印度龐大的消費市場與商機，則為歐商所覬覦，加上歐盟乃是印度最大的貿易伙伴，約較第二位者（美國）多出兩倍，因此奠定雙方由經貿合作邁入戰略夥伴關係之基礎。在政治上，歐洲國家與印度之間並無領土衝突或重大的政治歧見，民主政治的共同語言有利於雙邊關係的發展，而歐盟重要成員國——德國及印度也都希望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會，透過彼此扶持有助於雙方早日達成此一目標。兩造在全球化的國際局勢下，不僅力圖在國際事務上各自發揮重要影響力，更同時希望成為多極體系下的全球性重要強權。

中山大學中山所副教授張錫模是國內研究俄羅斯問題的知名學者，為了探討歐盟在前蘇聯地區的戰略角色及其影響力，特別從烏克蘭的政情發展作為研究的切入點。

在〈重返歐洲地緣政治：烏克蘭與美歐俄角力〉一文中，作者認為，地緣政治正在重返歐洲，該文分析烏克蘭在 2005 年這一年來的政局變動對歐亞大陸地緣政治的影響及其意義，焦點置於美國、俄羅斯、歐盟等列強在烏克蘭的地緣政治角力。該文首先討論「橘子革命」及其後烏克蘭政局變動的基本歷程與性質，再分析烏克蘭政治變動的地緣政治意涵，最後析論俄羅斯、美國與歐盟等強權在烏克蘭的地緣政治角力及其未來趨勢。

該文認為，未來如果烏克蘭在地緣政治上完全擺脫俄羅斯的控制，歐亞大陸將走向一條近四百年來未曾有過的新道路。相反地，如果烏克蘭在地緣政治上再度落入俄羅斯的勢力範圍，俄羅斯將確實有權力再興的機會，並因此在長期上足以使歐亞大陸走向完全相反的另一條道路。因此，烏克蘭在地緣政治板塊上的歸屬，不僅將重新界定俄羅斯的未來，而且將重新界定整個歐亞大陸乃至全球地緣政治的走向。在這層意義上，正在烏克蘭上演的當代地緣政治衝突，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

該文並稱，烏克蘭在 2005 年的危機已清楚地顯示出，俄羅斯對於傳統地緣政治的利益不會輕易鬆手，而俄羅斯為重新謀求鞏固其國家利益的意圖及行為，有可能會在歐盟的東部界線激發更多的摩擦。中東歐各國，尤其是波蘭、羅馬尼亞與波羅的海三國，迄今仍然對俄羅斯深切恐懼，給予了美國介入的空間，這使得未來的東歐再進行一場傳統的地緣政治競賽。

南地中海國家與歐盟的關係對於國內研究者較不熟悉，但是南地中海國家位居歐盟的南岸，是歐盟對外關係重要的一環。歐洲與南地中海國家的關係不僅有地理、歷史和文化的意涵，也有政治、戰略以及經濟各層面的考量。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助理教授卓忠宏在〈歐盟與地中海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與展望〉一文中，探討歐體／歐盟「南向」政策的發展脈絡。在研究方法上，以 1995 年「巴塞隆

納進程」(Barcelona Process)共同宣言，建立「歐盟-地中海夥伴關係」的合作架構為基礎，分析歐盟對地中海政策的具體實踐。最後在經由理論評估與檢討歐盟對地中海政策的運作成效。

該文認為，地中海自由貿易區才是歐盟與地中海關係發展之中心目標，但是雙邊夥伴關係十年來之進展卻遠低於歐盟之預期。歐盟與地中海戰略夥伴關係發展不如預期的因素在於：第一、目前地中海兩岸尚缺乏建立一超國家機構連結國家與體系的橋樑，作為協商與解決衝突的固定機制。第二、南地中海區域內有以巴衝突、以阿矛盾、北非各國疆界糾紛等問題，致使地中海南岸國家至今無法整合建立對等的區域集團與歐盟對話。第三、雙方的不對稱關係，以及彼此對於需迫切解決的議題看法並不一致。第四、歐洲過度以文化及宗教作為疆界的劃分，將中東北非國家視為非歐洲地區。政治經濟的差異與文化的隔閡導致伊斯蘭基本教義派仇視北方的歐洲，歐洲極右派份子排斥外來移民。這道無形的界線也進一步阻礙了地中海國家與歐盟的統合。

本書得以出版，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歐洲研究中心要再次感謝各位學者的熱心參與寫作，也對於外交部的出版補助表達由衷的謝意。助教陳蔚芳與李霖在研討會時做的協助，也一併致謝。由於經費有限，本書由排版到校稿，都是由主編張亞中負責。由於個人能力有限，在忙著教學、研究以及「全民倒扁」社會運動的同時，本書編排的錯誤在所難免，期望讀者能以包容的心情多多體諒。也代表本書的作者向讀者表達謝意，希望對於文章的不同意見給予指教。

願藉本書的出版與國內研究歐盟者互相勉勵，共同為歐盟的研究一起努力。

張亞中

2006年7月仲夏於台大社科院研究室

歐盟與美國： 「柔性平衡」或「硬性平衡」？

甘逸驊*

壹、前言

後冷戰時期國際體系的主要特徵即在於由美國所扮演的單一超強角色，在重要的國際議題與區域安全問題上，這一超強擁有相當程度的自由選擇是否與次級強權(second-tier great powers)進行合作或對抗。普遍被視為次級強權的中國、俄羅斯、日本與歐盟，以及其他可能興起的區域強權，在個別的政策或議題上，以單獨或聯合的方式，採取與美國相符合或是分歧的立場。但是，其中最值得關注的問題是美國與次級強權之間的關係是否在後冷戰時期逐漸形成在系統層次的平衡關係？是否有單一次級強權形成與美國抗衡的態勢？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次級強權是否形成正式或非正式的聯盟，以平衡美國為目標？

在這些次級強權或可能足以威脅美國優勢的潛在超強當中，歐洲聯盟扮演一個非常特殊的角色。一方面歐盟藉由其多面向力量的發展已逐漸建立起全球的戰略地位，並運用國際多邊機制推動歐洲所主張的價值體系，因此屢與美國的立場相違背；但在另一方面，歐洲與美國分享重要的文化與宗教基礎，雙方在重要國際議題上仍有高度重疊的共同利益。然而，後冷戰時期歐洲與美國的互動，似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乎被雙方的歧見所主導，從反彈道飛彈條約(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 ABM)、有關環保議題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禁止使用地雷的渥太華會議(Ottawa Convention)協議、國際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的設立、飛彈防禦系統的建構等重要議題，甚至到死刑的廢止與墮胎的合法化等有關價值的爭議，歐美都抱持著截然不同的態度。在冷戰時期，歐洲與美國或許對於戰術性的問題具有不同意見，但對於全球戰略議題則意見幾乎一致；但是後冷戰時期兩者的差異，卻張顯了歐美在戰略議題的歧見。

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當中，現實主義界定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裡，強權之間如何藉由權力分配的過程，避免權力過於集中，亦即形成「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狀態，以維持國際社會與區域安全的穩定。但是傳統權力平衡的理論，針對的是強權間為維持軍事戰略利益所採取的軍事力量之平衡關係，對於後冷戰時期美國與其他次級強權的互動，缺乏解釋的效力。因此，為有別於傳統理論的「硬性平衡(hard balancing)」概念，學者們提出「柔性平衡(soft balancing)」的相對概念，亦即次級強權試圖以軍事力量以外的手段，獲致抗衡超強達成其戰略利益的目的。然而，柔性平衡概念的提出也遭致傳統權力平衡理論學者的強力批判，認為主張柔性平衡者刻意曲解權力平衡的理論，以試圖解釋後冷戰時期的現象；或是認為柔性平衡學者誇大美國與次級強權之間的矛盾，以張顯柔性平衡的存在。

本文的主要目的，即在於檢驗歐洲與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的關係，是否存在系統性的柔性平衡。首先，本文將概要指出現實主義對於權力平衡的主要論述，以做為之後檢驗柔性平衡的參考；接著藉由討論後冷戰時期學者們所提出的柔性平衡理論，一方面藉以理解為何在冷戰結束後，次級強權間並未如傳統理論所預測的產生硬性平衡關係，另一方面也試圖比較支持與反對柔性平衡學者之間的

論點；在實際的個案方面，本文特別著重在歐洲聯盟於後冷戰時期與美國在重要國際議題上的歧異，並因此檢驗是否形成對美國的柔性平衡策略；本文在結論部分，除了試圖在理論的層次，提出柔性平衡對於權力平衡理論的適用與補充之外，也期待在政策方面，提出次級強權的個別或聯盟可能藉由柔性平衡方式，產生對於新時期國際體系的影響。

貳、權力平衡

在進入有關柔性平衡的討論之前，有必要先將國際關係中對於權力平衡的概念加以分析，以便進一步瞭解權力平衡理論對於柔性平衡的解釋能力。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現實主義(realism)的核心概念之一，即為權力平衡的探討。國際與區域間維持安定的主要原因，在於體系層次(systemic level)的互動趨於平衡的關係，亦即在一個無中央權力機制的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各個主權國家為了獨立的生存，各自擴大軍事與經濟上的發展與利益，在其中具有獨霸優勢的強權逐漸形成，並試圖以擴張權力的方式來加強與維護其利益，但是當如此的強權逐漸興起時，其他感受到威脅的國家可能因而組成一個防衛的聯盟，藉由各自力量(尤其是軍力)的整合，形成對於獨霸以軍事手段進行對外政策的可能阻礙。¹

國際間權力平衡的主要目的，除了防止單一超強的形成之外，也在於維護次級強權與其他國家的主權與安全，因為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某些國家以軍事手段，進行破壞現狀的作為。在近代的歐洲歷

¹ 有關傳統權力平衡的理論，參見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有關權力平衡理論的爭辯，參見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3).

史上，出現過一些特例，例如歐洲強權容忍較小的波蘭受到瓜分，但一般而言，次級強權通常將某一強權侵略具戰略意義的小國之行爲，視爲這一侵略強權試圖主導其他強權的前兆。因此，次級強權可能會聯合那些受到主要強權威脅的小國，組成防衛的聯盟，以防止具獨霸優勢潛力的強權發展出足以主導國際體系的力量。²

但是當一個單極國際體系成形，依據結構現實主義者的論點，對於次級強權而言，超強始終對它們的主權與生存造成威脅。這個超強可能遭遇到部分或所有次級強權集體的抗衡，爲了避免這種抗衡，超強的實力必須超越所有次級強權實力的總和，當超強可以達到此一程度時，這個超強就成爲一個霸權(hegemon)。在一個單極國際體系中，次級強權傾向於組成一個類似雙極體系的聯盟，對於超強特定的對外政策，或者是此一超強的獨霸優勢，這種正式或非正式聯盟即表達反對以做爲抗衡，而對於超強而言，這樣的結盟具有一個早期預警的效果。

結構現實主義者認爲一個缺乏權力平衡狀態的單極國際體系，是一個最不穩定的體系。一方面，超強傾向於過度延伸其力量在不同領域與地區，就長期而言必定減弱其實力；另一方面，儘管超強可能刻意採取自制的對外行爲，次級強權仍可能憂慮超強未來的行爲是否具有侵略性，畢竟超強的優勢遠勝於其他強權，未被平衡的力量對次級強權而言，永遠是潛在的威脅。從歷史的觀點來看，現實主義者相當自信的預測，權力平衡是國際體系的常態，尤其當國際間主要戰爭結束時，舊的國際秩序瓦解，被新的國際體系取代，但無論新的體系被如何的呈現，平衡的行爲始終存在。相對地，單極國際體系只是人類歷史上的非常現象。³

² T.V. Paul,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51-52.

³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